

红
星
果
丛
书

方 方



珍藏版

影 记

方 方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方 方

一九九五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男作家王蒙主编的女作家作品系列丛书，

“女作家影记”序

名曰“红罂粟丛书”。该丛书一经面世便受到海内外众多读者的欢迎，并且在两年之内连续获得中国出版界两个奖项：第二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一等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红罂粟丛书”的重点策划人、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也似乎由此而引发出诸多出书的新奇的点子，独到的灵感。比如这套“女作家影记”的出版，便是得助于“红罂粟”之后他又一个新奇独到的思路。

这套由九位女作家每人一册组成的“影记丛书”，是“红罂粟丛书”的第二系列。每册影记包括作家精心挑选出的一百余幅照片，以及由照片引发出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诠释照片，或叙述往事，或抒发感慨，或思念亲友、师长……是照片引发了文字，而文字又丰富了帧帧照片这方寸之间的内涵。是照片引我们注视起写作之外我们自己的生活，亦使我们每个人对这本影记的写作比对其他时刻的写作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情感。应该说，“影记”的形式并非前所未见，特别在国际国内的演艺界，影视明星们推出华美、精致的“写真集”的早已不乏其人。但作家的影记与影视明星的写真集可能稍有不同：它既不是明星形象风采的汇集、展示，也不是摄影技巧和摄影艺术的竞赛表演。它侧重的是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写作、亲情、友谊相关的那些直观而真切的图版；它不回避的甚至还有作家在某一瞬间稍显狼狈的、或者说简直不便示人的形象。这样的照片，因为平凡而质朴，也许更能引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从中看到作为一个“人”的她，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女作家影记”的创意和写作宗旨便是在这样的前题下完成的。有人说照片能够揭示灵魂，有人说照片能够纂

改灵魂。姑且不论照片对灵魂的揭示或者篡改，我只想说有一点是定而无疑的：那便是当我们得知被拍照时，在瞬间与相机镜头的配合——以我们或幼稚、或刻意的方式。只因要配合的心情是真的，所以那被照片凝固了的瞬间，毕竟拥有着独属于它的某一种真实。

我常常觉得，一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与一个作家的一部书稿单独面对出版社是不同的，它需要几个重要环节的妥善衔接。首先是创意者意向的新鲜；其次它要靠出版社慷慨而热情的肯定，以及编辑们付出的诸多细致而琐碎的辛苦；然后它要求主编为此尽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必得有丛书的主角——作家们的积极响应。

面对出版在即的“女作家影记”，窃以为上述几个重要环节均已有了妥善的衔接。因此，第一我要感谢王亚民最初的美好创意；第二我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全体同仁从始至终的支持；第三我要感谢我的八位同行，她们对该丛书的积极响应和诚恳写作使这套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意趣盎然的人情味儿。比方最年长的宗璞老师，她的“影记”是抱病完成的；比方远在福建的舒婷，由于担心邮寄遗失，去德国之前她亲自携书稿飞至北京，当面交与出版社编辑。其余诸位，我亦深知她们对这次创作的珍视。最后我也想感谢我自己：作为此次被出版社邀请的主编，我为我对这套书所尽的微小心意和努力感到愉快。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有句话叫做“伸向过去的欲望是人的基本经验”。“影记”的编撰唤起了我们“伸向过去的欲望”，我们或简单、或深奥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欲望里和这样的写作里沉浮了一回。当“影记”完成之时，书中的我们也已经是过去的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了已经过去了的过去，或许会使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生出更多一些的珍重之情。而那所有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铁 凝

一九九七年六月八日

父亲三十年代中，在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读书。大学毕业前夕，学校组织了一次春假毕业旅行。由上海—杭州—南昌—武汉

一北京— 父亲的影集— 代序

天津—南京—上海，南北纵横，四千余里，沿途参观游览。父亲在出发前一个星期，跑上街买了个照相机，便持着这台照相机做了随团的摄影师。由此开始，摄影爱好便伴随着他一生。父亲后来将他们这次毕业旅行一路所拍的照片编成一本影集。正面贴着照片，反面则是当时所作日记。每张相片的下面，又加有文字说明或题记。比方在列车行进时所拍的“浙赣路上”的一组乡村风光。父亲在照片旁边写着：“青青的山弯曲的流水，一望无际的麦地……”；在陶然亭所拍赛金花的坟墓，父亲在照片上写着：“这是一代名妓赛金花的埋骨所，只有那古老的城墙和枯树伴她在晨风中叹息。”父亲的艺术感觉极好，气质又偏浪漫，故而影集中无论文字说明和照片编排都很有讲究。边看照片边阅读时年二十二岁的父亲所记录的三十年代大学生的种种趣事，真是兴味无穷。这是父亲所有影集中我最喜欢的一册。

父亲的影集先有五本，都编排得很细致，内容十分广泛。那里不仅有父亲为他诸多亲人和朋友所拍摄的照片，不仅有他所旅游过的风景名胜，还有他工作中一些项目的建设过程。甚至还有父亲的恶作剧。记得有一张照片是一男一女两人的背影。小的时候我们看照片，不解父亲何故拍人家的背影。父亲便笑说，他一个同事跟一女子谈恋爱，却死活不肯承认。父亲和另几个朋友便

探听得同事约会时间，悄然跟在其后，拍下了这张“证据”。那同事后来面对他们的询问仍然否认自己有女朋友时，父亲便拿出了这张照片。一时间让那同事看得目瞪口呆。父亲说起这种往事，总是大笑得自己不能自制。

父亲的影集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往事。几乎每张照片都有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外地工作的哥哥们每年回家，大家都要把相片拿出来从头到尾地翻看一遍。在我们家，这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这个享受是可以让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分享的。亲戚们乃至邻居们到我家来玩也总爱讨要我家的相片本看。对于他们，纵然看到的大多是陌生的面孔，却因能从照片的背景上体味到诸多往日的气息，追怀旧日，虽与自己无关，可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不致招惹麻烦，已经被浪一样一迭一迭而来的运动整治得异常胆小的父亲决定焚烧掉照片。焚烧照片的事是父亲和上中学的哥哥一起干的。很多珍贵的照片都在那一把火中燃为灰烬。父亲脸色发灰，母亲心疼不已。我记得他们在楼梯口的墙角里焚烧，一把一把地将照片往火里扔。因为焚烧时间颇长，以至那个墙角多年都一直黑糊糊的。现在想来是何等可惜！

父亲最珍爱的东西莫过于他的这些摄影作品了。尽管烧了许多，剩下来重新编排好的仍然有几大本。它们后来在搜家时终于被人全部搜去。所幸是几年后，这些照片竟然又物归原主。除了一些可疑怀疑的照片上不知被谁作了些记号外，余则皆未遭到毁坏。

抱回影集的那天，他一边上楼一边连喊带叫着，兴奋之情震动全楼。父亲当日即令我去街上买几本新影集回来，他声称要把未曾整理的相片全部整理出来。我积极执行父命，立即出了门，一下子买回两本。只是父亲对我的欣赏眼光大为看不起。父亲历来追求影集的高档精美，而我却买了两本样式很为简易的影集，这使得父亲每次整理时都要叹上几口气。他

⁵ 不知道那时的街上已经没有精美的东西卖了。

便是正在整理这两本影集的日子里，父亲在一天突然去逝。这两本影集就再也没有整理完。家里经父亲整理的影集一共有六本半。两个家族的故事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这六本相册中若隐若现。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财富了。河北教育出版社意欲出版女作家影记，提示可收入八十到一百幅照片并配以文字。这无疑是一种更好的保存方式。它们将永远不再会被遗失，也永远不会被焚烧一尽。于是我再一次将父亲的相册细细地翻阅了一遍。挑出其中一些编入此书。虽然这只是父亲影集中很小的一部分，⁶ 有许多有趣的东西都因篇幅缘故，不得已而放弃，但在这本书中，它们仍占据了一半的内容。为此，我感到十分满足。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最敬爱的父亲和母亲。让他们的子孙永远永远地记住他们。

权作为序吧。

方 方

·一九九六年八月八日

有一天，很偶然地打开电视机，看到里面正播放着电视连续剧《铁血共和》，剧中二号人物竟是杨赓笙——我的老公，不由得怦然心动。

自小便知，父亲家

我的老公

是读书人，母亲家是做官的。父亲家族出了个学者汪辟疆，母亲家族的名人便是她的外祖父杨赓笙。但是除此以外杨赓笙的一切：他为何人，从事何事，为何有名，我却一概不知。直到八十年代，许德珩先生在《人民日报》“我的回忆”一文中说二次革命中的讨袁檄文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我方从母亲和舅舅那里得知，那篇《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便是出自他们的外公杨赓笙之手。记得当时我十分惊讶。

从那之后，我便陆续从亲戚处知道了关于老公杨赓笙的一些事情。

老公杨赓笙，号咽冰，一八六九年出生，江西湖口人。十八岁中前清秀才，后又补廪生而拔贡。因忧国忧民而投身革命，是江西省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尔后长期追随孙中山其后，奔走呼号。李烈钧一九一三年在湖口兴兵讨袁——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老公公毁家纾难，将变卖家产的钱财，全都供讨袁所用。他自己则为江西讨袁之秘书长，愤而撰写了讨袁檄文，曾争诵一时。

“二次革命”失败后，老公同李烈钧一起流亡国外，临别前曾投石于江，并起誓“沉石于江，意志如钢，不灭袁贼，永不还乡。”

流亡东京期间，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值革命低潮，观望者犹疑者大有人在，老公公则一反众态，在宣誓书上打下五个指模表示他追随孙先生矢志不移。这是老公一生中很得意的一件事，以致他在八十岁时，尚作诗书记“八十光阴瞬息过，回首蓬山五指模。”对当时状况记忆犹新。

离开日本后，老公公便在南洋办报，并筹募经费，以图再度讨袁。一九一六年蔡锷在云南起义，老公公将筹募的经费，亲自从缅甸送至云南。据说蔡锷当时在欢迎宴会上说：“上次湖口起义，咽冰先生在台前，这次护国讨袁，咽冰先生在幕后，无论幕前幕后，咽冰先生的功劳都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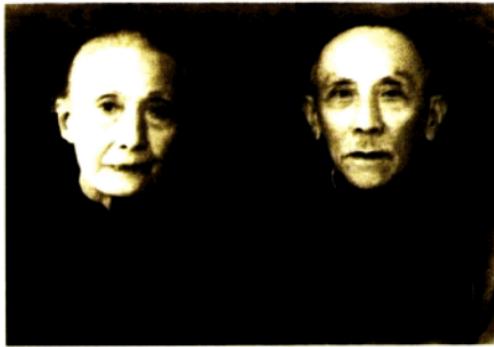
袁世凯死后，老公公回到江西。因其住宅在讨袁失败后被北洋军焚毁，李烈钧将军便出资在湖口为老公公修一新宅，并亲笔书写“筱竽堂”堂匾以及门前一幅“山中有宅开三径，天下何人守四知”的对联，并常去那里小住，说古道今，谈论诗文。老公公在政见上与蒋介石不和，故他除了一度任过江西省民政厅长和省代主席外，大多时间不被重用，仅长期拥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之虚职。

一九四九年，老公公响应和平号召，组织了江西和平促进委员会，主张走北平和平解放的道路。他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同六名副主任委员一起，被称为“江西七老”。不幸的是他们的和平愿望和他们本人都被强行送到了赣州软禁，直到赣州解放，才得以自由。

老公公死于一九五五年，这一年我刚好出生。虽然未曾见过他老人家，但为自己有着这样的祖辈而感到十分自豪。并为他们当年“宁为共和鬼，不做专制奴”的无私无畏精神而由衷钦佩。



这是父亲影集中的老外公照片，此照摄于哪一年全然不知。



因是大家族，老公公有妻有妾不足为奇。这是老公公和他的原配，也就是我母亲嫡亲外祖母的合影。这是我母亲当年珍藏的照片，因无说明故也不知道于哪一年。

4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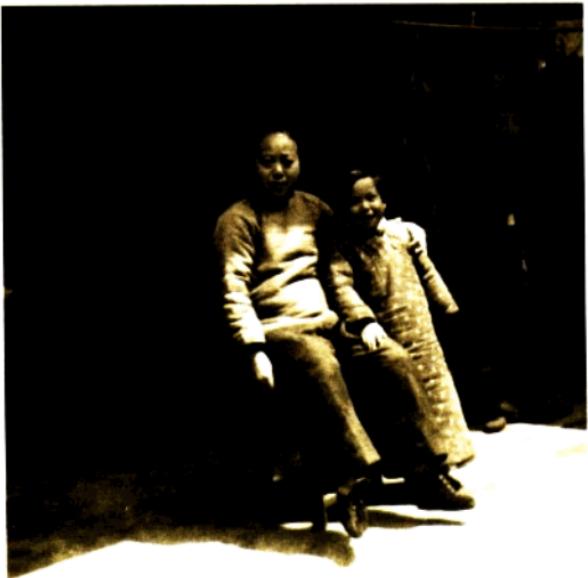
在父亲的影集里，竟从来没有祖父的照片。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知可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焚毁，还是在战乱中遗失？更或有其他别的

她就是祖母吗？

什么原因。这是我甚感遗憾的事情。

但我知道父亲对祖父是怀有深刻的情感的。祖父在父亲只是一个青少年时，便给了他相当自由的空间，对一个旧时代的老式人物来说，这就很不容易了。祖父后来被日本人杀戮而死。他的死十分壮烈。及至去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年时，祖父的学生们还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祖父的死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几十年中父亲几乎闭口不谈，仿佛说起来都要心痛。父亲一直深藏着祖父曾经写给他的所有信件。作为铁路桥梁工程师的父亲，多少年转战南北，丢失的东西不计其数，而祖父的信却一直伴随着他。“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把这些信件都塞在一个麻袋里，由我和哥哥一起将它放在厕所的顶上。以至得以一直保留至今。

我原先一直以为父亲的相册里也没有祖母的照片。可这次在翻阅相册时，竟在父亲大学毕业旅行的这一册中得以发现。斯时，祖父祖母住在南昌。父亲旅行途中，南昌是必经的一站，父亲于是回家探望了他的父母。父亲用他临行前在上海新买的照相机为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照了相，但何故没有为祖父照呢？我不得其解。



父亲在祖母的相片下题的字是“母一伏玉，伏玉是谁？我也不知道了。知情的老人相继离世，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长相女孩子来历。而这个表情呆板的老太婆，因了父亲标明的“母”字，想必她就是我的奶奶了。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三七年的三月二十九日，地点在南昌松柏巷五十二号。



我在父亲另外的一本相册里，又发现一张祖母的照片。大约是祖母在我的印象中十分淡薄，一次薄得仿佛没有这样的人的存在。所以我曾经翻阅过很多次父亲的相册，竟是都没有注意到她。父亲在这张相片下面注明的是“母”的娘，大妈，四娘，的娘和四娘是谁，我也不清楚。而大妈，我知道她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常教授的大爷王群麟的夫人。这张照片摄影一九三七年的六月，地点在南京结布场五号。这是南京大爷王群麟的家。照片中左边穿白裙者即是我的祖母无疑了。

南京爷爷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才四岁。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夏天，已经在武汉定居的父亲和母亲利用暑假之便，带我和三个哥哥回南京探望爷爷和婆婆。那时爷爷一家还住在晒布场五号。因为父亲从没有提及过我的祖父，故而我小时候都一直以为南京爷爷就是我的爷爷。及至许多年后，才晓得南京爷爷是我祖父的哥哥，而我的祖父在很久以前即被日本人杀死了。

南京爷爷

我出生的那年父母和南京爷爷住在一起。后因家中人多房少，我们一家租住进爷爷隔壁的房子晒布场二号。那是著名诗人、哲学家宗白华先生家。南京爷爷与宗先生当时皆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至今搞古典文学的人也大多知道“汪辟疆”这个名字。这便是爷爷的名字。

南京爷爷有一头短硬短硬的白发，常抑扬顿挫地用他变了味的乡音唱诗。爷爷当时的房子有三层楼，爷爷住在一楼，他的房间和婆婆的房间门对门。爷爷总是坐在侧门口，每当我路过那里，他便抬起腿一伸，在门口架起一道栏，不让我进门。直到我急得意欲放声悲哭时，他才哈哈大笑着收回他的腿。爷爷管我叫小妹，他浓厚的江西口音使得这“小妹”二字变成了“肖妹”。这便是我四岁那年南京爷爷留在我心中最为深刻的印象。

南京爷爷虽是父亲的伯父，但父亲对南京爷爷有着情同父子的感情。或因为父亲在上海读书常去南京之故，也或许是因为祖父去世过早父亲以南京爷爷家为己家之故，总之父亲的生活里充满了南京爷爷的烙印。父亲喜欢古典文学，常同南京爷爷信来信往谈诗论词，爷爷亦经常开出书目甚至亲自寄书来指导父亲的阅读。爷爷编写的《唐人小说》，父亲读过好多遍，书上布满了他阅读时勾勒的红线以及他作的眉批。有一年，爷爷中了风，半

身偏瘫。但他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右手不能写字，便用左手写。他用左手写出来的字同样潇洒漂亮。他给父亲的信后总是落有“方湖左手”四个字。父亲常常在家说爷爷这样一个老人，人都中了风，却还这样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而且用左手练出那么一笔好字，这得什么样的毅力才能做到呵。父亲说这些话时总是感慨万千，然后便要求我们当以南京爷爷为榜样。爷爷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真是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南京爷爷同父亲有过许多通信，我大多都读过。从爷爷信中，我能感觉到他老人家一颗纯真不过的心。大约在一九六二年，南京修路，晒布场爷爷自家的房子要拆了。国家拟另盖一栋房子给爷爷一家居住。这期间，爷爷一家必须住一段时间的过渡房，等新房盖好再迁进去。对于爷爷这样一个大家庭，这是件很麻烦的事。但是我在爷爷给父亲的信中，看不到爷爷有半点的怨言，倒是满纸的欢欣。一信说：“我近时已经移寓南大宿舍鼓楼四条巷二十六号，晒布场五号之屋因东海路开辟已经拆去，非但我屋即宗白华与前王晓湘熊纯如汤用彤宅都已让出。将来此路为沪宁之第一条最新最美之大马路，当与北京媲美可断言也。”还建的新房选好地皮后，南京爷爷又在信中如是说：“新宅已在峨嵋路正式动工，其地左玄武右鸡笼（即北极阁），前林后岗，风景极佳，适宜住家，较之珍珠河旧宅更为优胜。”因为父亲是学建筑的，在新房修建期间，爷爷希望父亲能去看看房子结构情况。父亲便专程去了一趟南京。父亲认为新房比之老房子结构合理，更适宜于居家生活。后来爷爷搬入新宅后，果然甚觉满意。爷爷在来信中说：“我自问无德于人。年来蒙党与政府格外照顾，又不能稍竭绵薄替人民有所尽力，居之有愧，真不知如何来报答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真诚呵。

南京爷爷死于一九六六年初，丧事办得很是隆重，到处都堆着花圈。但一九七二年我去南京，表兄表姐带着我去给爷爷扫墓

时，已经想见不到当年的隆重之景了。爷爷坟头的石碑被造反的南京大学的学生砸倒在路边，一抔黄土覆盖了爷爷慈祥的面容。虽然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容颜，亦听不见他的声音，但在我们的心里，爷爷却是永远活着的。